

中國論壇叢書

中外學人年譜集刊

第一冊

周憲文編著

中國論壇叢書

中外學人年譜集刊(一)

周憲文編著



自序

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歡喜推理性質的研究，討厭記憶性質的事實。說明白些，我專攻經濟理論；雖然我也讀經濟學史與經濟史，這是爲了幫助經濟理論的理解，不是爲要知道兩者的變遷事實。這一情形，也許與我的記憶力有關。比方說：Adam Smith的生年與國富論的出版年，不說看過，祇說寫過，可能會在千次以上；但是，直到此刻，我還記不得。最可笑的，兩分鐘以前剛查過，兩分鐘以後還要查。這一現象的形成，主要原因，固然由於我的記憶力差，但也由於自以爲記憶力差，不去記憶，所以弄到這一地步。當年，我在大學教書，第一課，首先向學生聲明的，就是我記不得年月日與數字，臨時答不出來。

以上是我青年及中年的情形；到了老年，不知爲了什麼，情形丕變。我已討厭理論，歡喜事實。近20年來，我翻譯了八部經濟史的世界名著，最近我還在編譯「西洋經濟史論集」。雖然我仍記不得所譯書籍的內容，但在翻譯或閱讀的時候，興趣盎然，大有好感。由於這一轉變，我才開始注意經濟學者的生平經歷，進而寫作經濟學者及世界學人的年譜。數年以來，成稿凡180篇。因此，這幾年來，我對年譜累積了一些經驗與觀感；現在把它記錄下來，以代自序。

二

什麼是年譜呢？它是「按年記載一人生平的事蹟」。它的特點，就在「按年」；它與傳記不同的地方，也就在此。據我「發現」（我用「發現」兩字），它完全是「中國的」；說西洋也有年譜，這是「純瞎說」。西洋有的是簡單的「年表」，附錄在專著的書首或書尾，我未看過一本「年譜」的專門著作。有人以「年譜」譯 *Biographie*；嚴格說來，*Biographie* 是傳記，不是年譜。中國之有年譜，始於宋代，如薛執誼的「六一居士年譜」及洪興祖的「昌黎年譜」；從此以後，作者繼起，入清最盛。日本文化傳自中國，所以日本人也有年譜的專門著作。明治維新以後，國力漸強，文化益盛；對於年譜的寫作，却未受西方文化的影響，反而更加發達。至在西洋，祇有自傳或傳記，絕無年譜的專門著作。日前，我看到一本西洋學人傳記的翻譯，末附年譜。我很奇怪，怎麼西洋人也寫起年譜來。我寫信請教譯者，這篇年譜是原來就有的，還是譯者附作的；沒有答復。後來，我在一本日文的翻譯上，看到同樣的一篇年譜，乃始恍然大悟，解決了心中的疑問。因為那位日本的譯者，明白交代：這是由他編撰的。

年譜與傳記（或自傳）的不同，就在是否「按年記事」。我曾有過這樣的經驗，首先寫在這裏。R. F. Harrod 的 *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*，上下兩冊，是 Keynes 傳記的權威；但在我的「J.M. Keynes 年譜」上，引用極少。再如鹽島仁吉的「鼎軒田口先生傳」，是本 433 面的大著，內分 42 章；我曾用以撰述「田口鼎軒年譜」，四次易稿，終於放棄。為什麼呢？就因年歲有欠分明。

因此，我有一偏見。傳記易寫，年譜難作。因為：前者可就所知，儘量發揮；不知道的，可以不寫。後者就無此方便。例如

一個人的生死年，如果不知道，就無從寫起。再如 J. R. Commons 自傳，他說在年輕時當過排字工人，這在傳記上可以，在年譜上就有問題；因為所謂「年輕時」，到底是那一年。

三

講到中國的年譜與西洋的傳記，有位已經去世的先生（胡適之）曾有意見。他認為前者過於簡單，後者比較詳細。這是事實（不過，我要補充一點，他祇看到西洋傳記或自傳比較詳細的一面；也可以說：他沒有充份了解年譜與傳記的不同；詳見下文）。因此，他希望中國式的年譜，要吸收西洋式傳記的寫法：取「長」補「短」，以期完善。這話可供參考，可以儘量朝這方向做；但是，不可能完全做到。問題就在年譜與傳記是兩回事。比方說：一件牽連多年的複雜故事，這在傳記，可以專章（甚或分章）集中敘述，講得淋漓盡致；至在年譜，一件事往往分繫在不相聯續的若干年份之下，其間夾雜着許多毫不相干的故事，自然有欠完整；不過，注意寫作的人，即使分年敘述，也不會忘記它的「來龍去脈」。因此，這不是根本的問題。祇要年譜的作者記住「故事」的完整性，交代清楚，不要前文不接後語，就已足夠。還有一點，我們必須注意：年譜主要是備「查」的，不是備「讀」的。在這意義上，它可以說是一種工具書。這猶如字典。當然，字典也可讀，我且確實知道有人「讀字典」。傳記就不同。傳記主要是備「讀」的。再說通俗些，你可以拿一個人的「傳記」當作故事講，講得「頭頭是道」，聽得「津津有味」。年譜就不宜於「講」，也沒有人要「聽」。要使「年譜」「傳記化」，這是不可能的，至少是有限度的。所以，相形之下，年譜就比較簡單而枯燥，傳記就比較詳細而生動。

抑有進者，一篇年譜對於每一「故事」，都要寫得像傳記這

樣完整，一定是「長篇巨著」，這固然也有可能；但是，這樣的年譜，一個人一生祇能就他專門研究的，寫上一、二篇。像我這樣寫中外學人年譜，每篇以不超過萬字為原則，是絕不可能的。不說別的，祇說著作；這比「故事」，簡單多了。可是，著作的內容，却是十分複雜。例如：我寫Einstein (1879~1955)年譜，祇能說某年著某書，無法介紹著作的內容。這因我對他的著作，根本外行；固然，我未始不可參考外文，加以說明；但是，這樣的說明，「生吞活剝」，貽誤不免，於心不安。因此，我寫的學人年譜，對於各人的主要著作（都是世界名著），凡我所能了解的，都有扼要的介紹；至於我不了解的，那就祇好說：某年著某書，而不及它的內容。我希望：有心有識的人士，要「發揚國粹」，多多提倡年譜的寫作；每人就他專攻的學人，寫一、二篇詳細的年譜。這有三種好處：（一）是世界名著的扼要介紹；看年譜等於讀名著。（二）可以知道這些名著的產生由來及其影響趨向；因在年譜，例有「時代背景」的參考資料。（三）至對學人經歷的了解，猶為餘事。

四

我因寫外國學人年譜，看了很多西洋人的自傳或傳記；發現他們的寫作態度或寫作方法，是有特殊的地方。就一般來說，他們不大歡喜寫童年瑣事（不是不寫）。一本自傳或傳記，往往一開頭，就是某年進大學或大學畢業；在此以前，往往一片空白。甚而至於，一本自傳，往往理論縱橫，絕少事實。我不想在此逐一舉證，浪費篇幅；姑舉一例，以概其餘。例如 Ronald W. Clark 著 Einstein 傳，是本數十萬言的名著；著者以千餘言形容 Einstein 臨終的情形，但是不見他去世的年月日。這在傳記可以，在年譜就不可以。

不過，西洋人寫的自傳或傳記，也有特別可取之處；他們少說假話，少有忌諱；它的可靠性，遠勝於中國過去一般的年譜。因為我們的「傳統」，是「隱惡揚善」，尤其對於已經去世的人。還有，中國人寫年譜，由於「宗法」觀念，歡喜追溯到千百或數千年前的「始祖」，而且「盡往高處攀」；西洋人寫傳記或自傳，往往連父母的名字都不提的。同樣由於「宗法」的觀念，中國人寫年譜，總要寫到子女；西洋人寫自傳或傳記，就不一定會講到子女，可說很少講到子女。

年譜的寫作，最好的根據，當然是自傳或傳記；不過，由於上述，根據西洋人的自傳或傳記寫作年譜，很多事情，常是無法交代；所以要寫一篇完整的年譜，是件極困難的工作。一個人一生能寫一、二篇完整的年譜，已是了不起；像我這樣寫中外學人年譜集，祇能就手頭所有的資料，拼湊成篇；距離「完整」，自然很遠。這，除了資料的不足與學人的著作過於專門（在我無法了解）以外，還有文字的問題。因為一位著名的學人，他一定精通多國文字，甚而至於已成過去的拉丁文與希臘文，他可隨意運用；但在寫作他的年譜時，就有困難。在這方面，我幸虧多位朋友的協助，勉強克服難關。而事實上，我的手頭還有十餘篇未完的稿子，問題就在若干外文不能了解，朋友們也無法協助，工具書又缺乏，祇好放棄了。總而言之，年譜很重要，需要提倡，需要寫作；一個人要寫「中外學人年譜集」，這是近乎「荒唐」的開創工作。我因愛好，不計毀譽，盡力為之，聊供參考，如此而已。說它沒有「必要」，這是不正確的；說它寫得不好或不够充實，我可同意。

五

我已說過，我因寫年譜，收集了很多西洋人的自傳或傳記。

我很想找些討論年譜的著作，遍尋無着。這在西洋，當然不會有；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年譜（著作）。這在日本，我也沒有找到。至於中文的著作，我祇找到一篇；那就是梁任公的「譜牒學」。梁先生分年譜為四類：第一類是自撰年譜。『年譜體興，自譜蓋鮮』；『明以前，靡得而指焉』。第二類為『友生及子弟門人為其父兄師友所撰年譜』。『此類譜，雖極多，可稱者寥落』。因出『親故之口，慮多溢美』（按：大多類似「先君行述」）。第三類為『後人補作或改作昔賢年譜』。『此乃當時未有譜而後補作；或雖有譜而未完善，後人踵而改作者。此類作品，其一，必譜主為有價值的人物，得作譜者之信仰，故無下駟濫竽之病；其二，時代已隔，無愛憎成心，故溢美較少：此其所長也。雖然，亦以時代相隔之故，資料散失或錯誤，極難得絕對的真相：此其所短也』。故作者必須『為極勤苦、極忠實的考證，務求所研究的對象得澈底了解』。『此類補作或改作之年譜，最好充份表現此精神，故在著作界足占一位置焉』。第四類為『純考證的遠古哲人年表。此類性質，與前三類皆不同；不重在知其人，而重在知其確實之年代。故不作直行之詳瞻年譜，而惟作旁行斜上之簡明年表』。

我寫的年譜，可以歸入第三類的「後人補作」之內。梁先生已經道出它的「所長」與「所短」，我當引以自勉者，祇是『為極勤苦的、極忠實的考證，務求所研究之對象得澈底了解』。

最後結論：（一）年譜完全是中國的，西洋沒有年譜。（祇有附錄性質的簡單年表）。（二）年譜主要是備「查」的，傳記主要是備「讀」的。（三）年譜絕對重要；它的重要性與自傳或傳記，可說「各有千秋」。（四）學人年譜，尤其重要；由此不僅可以知道學人的經歷，且可知其名著的大要及其「來龍去脈」與「承先啓後」。（五）這樣的年譜，難得寫好；中外學人年譜，更不是一人可以寫得好的。

六

常言道：「敝帚自珍」，文章總是自己的好。我却要向讀者敘述本書的缺點。

寫年譜，有一基本條件，那就是年月分明，至少是年歲分明；否則，就不成其為年譜。它與普通的傳記不同，也就在此。我為了寫年譜，搜集了大批的傳記，結果極少是派得上用場的。原因就在：年歲有欠分明。我在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原想使各篇的體裁一致，後來因受資料的限制，不能不「各說各話」。這就一本著作來說，自是一大缺點。

寫年譜，另一重要條件，必須逐一註明出處。因為年譜是歷史，歷史要有根據。這在本書，沒有做到。至其原因，倒不是不明出處，而是限於篇幅。蓋如逐一註明來源，篇幅就得增加三分之一，這在每篇發表的時候，就有困難。因為目前我們很少，也可說沒有如此嚴謹的期刊。這在本書，不僅是一缺點，而且是一損失，是一很大的損失。因如註明出處，篇幅固可增加，「小著」變成「大著」，而其學術意義，那就大不相同。如在註明出處的時候，能再加以考據與辯證，則其學術意義，將更增加。格於環境，我未能做到這一點，衷心良苦。

我的字，本已草率，有似天書，加以年老手顫，更不成形。何況每篇的寫作，不是一氣呵成，乃是東湊西補。稿成以後，不僅有些字，自己都不認得，更攪不清上下文的銜接所在。因此，不得不麻煩勉強可以辨別的朋友，重抄一遍，甚而至於兩遍。當然，每經重抄，我都重讀；但在此情形之下，錯誤自所不免。本來，校對如掃落葉，這樣的稿子，印刷出來，其結果是可想而知。說到校對，感觸良多。明明已經改正，往往結果又是弄錯。幾次校正的稿子，上版印刷，也會走樣，使人啼笑皆非。

此外，還可附帶一提的，是關於數字。數字的正確，原是極重要的，這不僅在年譜而已。但我對於這一方面，特別差勁。原稿筆誤，不用說了；初校排錯，如未校出，就會一直錯到底。再就是「年歲不饒人」，老眼昏花，英文字母，如n與u，h與k，六號字的，時常看錯。初稿錯了，不易校出；在這方面，幸虧莊其昌先生，不時給以改正。

總而言之，比方縫衣，這不是先有整塊的布料，按照計畫，任意裁剪，大多是由一些大小不一、顏色異殊的碎料湊拼而成；其不統一、不調和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兩件都以碎料拼成的衣服，固然是不統一、不調和；而以整料裁成與以碎料拼成的衣服，擺在一起，也是不統一、不調和。讀者如有機會，看看我的原稿以碎料拼湊的情形，就可明白。

還有，初見的人名，應當註明他的生卒年，本書也未能完全做到。主要原因，是手頭工具書不全，無可查考。

現在再說本書的寫作經過。這不得不感激李應兆先生。他主編銘傳學報，一再要我寫點東西，我實在找不到適當的題材；因為我翻譯過「國富論」，所以想到Adam Smith。於是，寫了一篇「Adam Smith年譜」。誰知，這却引起了我對這一方面的興趣，接着就又寫了一篇「T. R. Malthus年譜」。興趣來了，我就開始收集有關資料，一口氣寫了五篇。手頭資料，已經用完，我以兩天的工夫，跑遍臺北出賣外文書報的店鋪，結果一無所得。我又跑了幾處較有希望的圖書館，也是空手而回。就這方面來說，我所看到的，大有一片沙漠之感。於是，我想起旅居東京的齊濤兄。他是我的老同事，非常念舊，願供奔走。我想：如果我們也有像大英博物館附屬圖書館或日本國會圖書館（齊先生來信說：它的卡片箱佔滿一層樓），讓我在其中耽上半年，這有多好呀！

寫到這裏，我自然難免有些感慨，請讀者允許我發洩一下，但千萬莫以為是牢騷；這是希望祖國進步。二次大戰以後，日本

從廢墟迅速復興，到今天，已成世界經濟強國。有人就說：日本人如何高明。這一說法，不僅似是而非，而且含有毒素。因如日本的復興全是日本人高明的結果，那我們除了徹底改造人種以外，還有什麼前途？我們勢必永遠落在日本人的後面。據我個人的了解，就人論人，我們不但不比他們差，可能還比他們強。不說別的，就說在大學讀書，中國人的成績常在日本人之上。問題是在：伊藤博文回國，促成明治維新；嚴幾道回國，就對國事毫無貢獻。這是由於社會的環境。說個比方，日本人是泥粉，加水變成泥塊；中國人是沙子，它可變成水泥，絕非泥塊可比，但得設法加以凝結。這是現代中國政治的責任，否則就成一盤散沙。它的功用自然不及泥塊。問題是在這裏，千萬不要弄錯。說日本人如何高明，中國人不如他，這是十分荒唐的。

有位關心本書的朋友，他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：為什麼要寫日本學人的年譜？由此，也可看出：八年抗戰，遺恨未消。但是，學術是沒有國界的；而知彼的工作，尤為重要。何況我是在日本求學，說實在的，寫日本學人的年譜，比寫西洋學人的年譜，尤有親切之感。我的老友，收到我的年譜抽印本，他們比較歡喜看的，也是那些日本學人。

七

俗語「積少成多」，又云「聚沙成塔」；近幾年來，我在不知不覺之間，已經寫了180篇中外學人年譜，本想湊足200篇，半因資料難得，半因另有工作，必須一趕（我在趕西洋經濟史），而停止下來。同學們因議彙編，為我80生辰的紀念，盛情可感；在我也可得一比較完整的記錄。

我必須附帶一述的，像這樣的學人年譜，實在過分簡單，就學術的觀點來說，是沒有多大價值的；但就實用的觀點來說，可備參考，不無用處。

我們這一時代，是一新舊交替的時代，我們雖在七十多年以前，推翻了三千餘年的封建專制，但在我們的意識上往往仍留下一些封建專制的渣滓而不自覺。我對這一方面，自問是十分小心的：用字違詞，都很注意。所以，深知的朋友，每稱「某老不老」：但是，有一天，有一朋友竟在我寫的年譜上，點出了問題，因在其間，居然出現「未亡人」三字。這三字，雖然大家常用，報上常見：但這畢竟是違反時代的。「他稱」比「自稱」更不應該。「舉一反三」，「由小及大」，可知進步是不容易的。

又有一位朋友說：這樣的「年譜」，確有參考的價值，十分需要，但就寫者來說，恐怕是犧牲的。他的理由，好像教科書，甚而至於辭典，儘管重要，但非著作，不能成名（教科書與辭典，只有編者，沒有著者）；不過，還可求利。我同意這位朋友的眼光。我寫「年譜」，全由興趣，「名」、「利」與我無關。問題倒在：本書的內容，過於廣泛，而我手頭的「工具書」，又太缺乏；錯誤不免，貽誤讀者。

末了，似乎還有三點需要交代。

1) 是本書名為中外學人年譜集刊，相形之下，似乎「中」「外」的人數，不成比率；中國學人太少，而且偏重於詩人，也不能代表學人。這話不錯。問題是在：本書祇是「集刊」，不是有計劃的寫作。所以，不僅是中國學人，就是外國學人，也祇是「集刊」而已；寫作以前，未有計劃。

2) 是外國學人內，有 R. J. Nehru 一篇，Nehru 似乎不是學人；這，我在「Nehru 年譜」已有說明，茲不再贅。

3) 本書編次，原以譜主的生年為序，不分中外；這有我的「想法」；但是，出版當局主張「中」「外」分排；也有道理。

周憲文於惜餘書室

時年78歲

特 載



陸費伯鴻先生

(1886~1941年，享年56歲)

陸費伯鴻先生年譜

（我在拙著「橘逾淮集」的弁言上，有過這樣的一段話。『陸費伯鴻先生是「中華書局」的創辦人，也可說是「中華」的家長。我在日本京都大學一經畢業，他就約我去當編輯，主持「新書」的出版；不久，還負責「新中華」雜誌的編輯。三年之後，我莫名其妙地、也是十分荒唐地，去當什麼駐日本留學生監督。我去看他，他頗不以爲然；經我說明經過以後，他說：『那你祇好去；不過，這事不能做久，也不宜於做久。「中華」的大門，仍是爲你開着；隨時歡迎你回來』。一年以後，我回上海；我還沒有去看他，他已爲我介紹給宋漢章先生，主持一人壽保險公司的工作。當時，我已接受國立暨南大學何校長的聘書。但我仍去看了宋先生，請他原諒；當然，我也看了伯鴻先生，向他道謝。從此以後，我們就未見面。直到抗戰中期（時政府已遷重慶），有一天，中華書局編輯所長舒新城先生來電話，說伯鴻先生有電報，要我去香港。我問什麼事；他說：你去了，會知道。長者命，不可違；我去了。原來，伯鴻先生觀察時局的發展，認爲上海總有淪陷的一天；他「未雨綢繆」，打算屆時將編輯所遷至香港（當時，「中華」在香港已有相當規模的印刷廠），讓我先爲準備。他在沙田租了一所房子，要我搬去與莊澤宣、徐悲鴻兩先生同住（後來，承悲鴻先生贈我一幅「馬」，十分名貴，可惜在重慶丟了。）我說：這不是眼前的事，也不一定發生；住着領乾薪，如何行呢？他說：那你可隨便爲「中華」寫些東西，同時做點準備工作。我總認爲「受之有愧」。時適何校長來信，要我去重慶一

趨，替他接洽校務；我持信去看他，而且表示有去的意思。翌日，他在香港仔爲我餞行。他說：『那末，你就去罷；希望你今後重重地跌一交』。我說：『我是跌不起的』。他說：『不會的。』接着，他鄭重表示：『「中華」的大門，永遠爲你開着；我希望你在跌了一交之後，安心回來』。臨別，他送我三百元港幣，以爲旅費。當他在香港病故的時候，我由上海趕去；遲了一天，他已下葬，伯鴻先生的生平，我所知不多。但他對我，真是「恩深似海」；我辜負了他的培植，內疚萬千。午夜夢迴，感愧交併。多年以來，我總想把我這番心情，表示出來；苦無適當機會。現在，我亦白髮蒼蒼一老翁，風燭殘年；我祇好藉此機會，一抒積愆；雖然在這「橘逾淮集」的弁言裏表示這一崇高的敬意，大不妥當；但是，除此以外，又有什麼機會呢？我想：伯鴻先生是會原諒我的。現在，臺灣中華書局贈我一本新印的『陸費伯鴻先生年譜』，內附「傳略」、「生平略述」及「自述」，我據以寫作本文。（目的全在紀念伯鴻先生；我要把這篇年譜收在我的「中外學人年譜集」裏，以廣流傳。）

1886年、1歲

8月20日，先生出生於陝西漢中府；複姓陸費，名達，字伯鴻，號少滄。原籍浙江嘉興府桐鄉縣。父芷滄，時遊幕陝西。母吳氏，善教育。先生自述：「我爲什麼姓陸費」，『我家是周朝周公旦之後，周公字伯禽，封於魯，他的後代衆子有食采於費（今山東省費縣）的，便以費爲氏，經漢唐宋等朝代，都有名人；明朝中葉，已遷到浙江省桐鄉縣。我十七世祖出嗣舅父陸氏，便冒陸姓。又隔數代，因費氏本支無人，便兼祧兩家，複姓陸費』。

1887年、2歲

二弟塏，字仲炘，生於興安。

1890年、5歲

母親初教識字。先生幼好嬉戲，有四趣事。（一）自製蠟燭，燃之夜遊。（二）拔生鷄毛，製鍵子。（三）學人鎔錫。（四）因弄火灼焦腿肉。

1891年、6歲

冬，『先生祖母查太夫人，欲與其適新建張氏之女同住，先生遂隨父侍祖母舉家遷南昌，途中行84日，歲暮抵南昌』。

1892年、7歲

『先生尊人芷滄先生以佐雜職保舉聽鼓江西。』弟執（叔辰）生。

1893年、8歲

冬，『母吳太夫人大病』。『祖母及女傭極信佛，輒以信佛詔我。我母病重時，令我往城隍廟求神……虔心祈禱……。南昌風俗，五月間輒賽神，祖母命我等見神必拜，否則有禍。一日，人家嫁娶花轎行過，我以為神也，亟下拜，見者皆大笑，我方知其誤』。

1894年、9歲

因母病初癒，先生『從鄰居劉先生讀』，初閱綱鑑。『一日閱明鑑，見有「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」，詢吾母曰：『臣不背負君，反令君背負臣，此何說也。我母大笑……。』母親教先生學習珠算。夏，『我母懼我等戲於烈日下也，獎勵習字，每寫一張，給制錢一文；我努力為之，最多之日，寫至五十六張。』

1895年、10歲

先生『因不願入塾，仍在家由母授讀』。『秋冬之交，先生與叔弟同患瘡疾』。

1897年、12歲

『先生尊人補新喻縣羅汎巡檢，携眷赴任所，先生由父授讀』。從本年起，先生『性質大變，不好嬉戲，好習畫，想